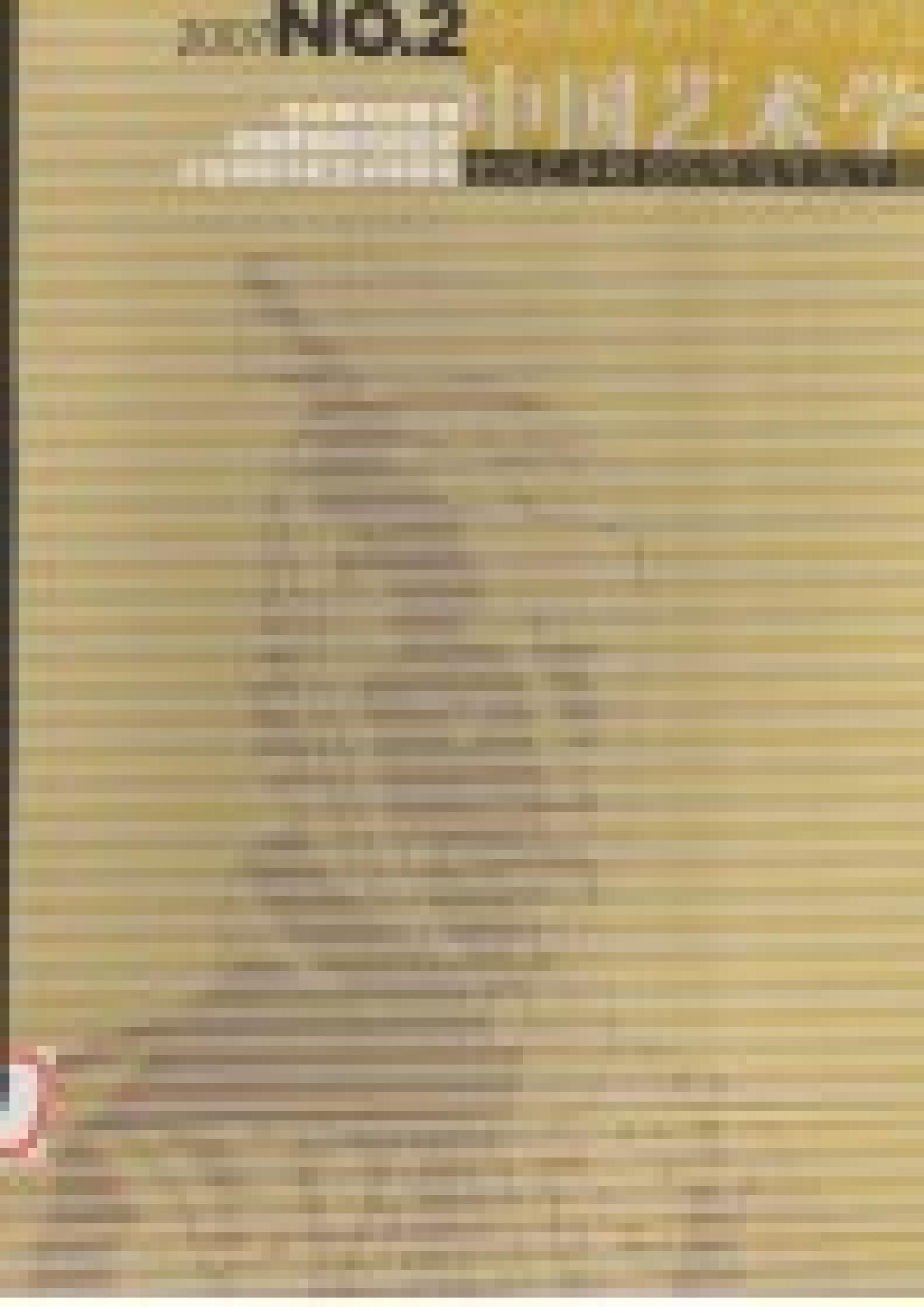


2009-10-2



J12-53

7

:2

、2

2007 NO.2 CHINA ART SCIENCE
中国艺术学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学报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中国艺术学.2 / 《中国艺术学》编委会编.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2
ISBN 978 - 7 - 5039 - 3199 - 4

I . 中… II . 中… III . 艺术 - 中国 - 文集
IV . J1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4358 号

中国艺术学 (2)

编委主任 王文章
主 编 张晓凌
责任编辑 蔡宛若
责任校对 方玉菊
英文审校 李 妍
设计总监 何 洁
版式设计 王进展
胡 妍
出版发行 **文化藝術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北京图文天地中青彩印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7 年 2 月第一版
2007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16
印 张 12.5
字 数 3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3199 - 4 / J · 841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本期话题

艺术研究的真谛

-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2006年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孙家正 001
分析指数与国家发展的文化标准 贾磊磊 003
论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原则 王列生 010

史学研究

中国青铜时代的艺术

- 研究方法与途径 方闻（黄厚明、谈晟广译） 019
四本《文姬归汉图/胡笳十八拍图》
绘制时代的重新审视（上） 邵 彦 034
万历末年嘉兴书画世界中的文人 万木春 051
早期的感性选择对钟饶数理提炼的意义 孔义龙 071

理论与方法

方位转换中的艺术学研究

- 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方法与视角 方李莉 082
舞蹈文化人类学与贵州傩舞研究框架初探 罗 斌 099
美术史视野中的知识和观念
——德国近代哲学美学和王国维的批评范式 杨振宇 114

田野调查

村落中的文化表演

- 安徽贵池荡里姚村傩仪式乐舞活动考察报告 孟凡玉 130

青年论坛

- 从文本到舞台——徐慕云戏曲本体论刍议 毛 忠 151
近百年朱有墩研究的变化 王学锋 158
多元与混杂

- 90年代台湾前卫艺术与“本土化”取向 陈 明 167

海外视线

- 致王文章院长 李幼平 172

艺苑掇英

- 赵建成 180
闫 平 188

THE TOPIC

The Essence of Art Research ——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for Freshman of 2006	Sun Jiazheng	001
Analysis Index and Cultural Standard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Jia Leilei	003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Constructing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Wang Liesheng	010

HISTORY STUDY

Art in Chinese Bronze Age: research method and approach Fang Wen (translated by Huang Houming, Tan Shengguang)	019	
The Review of The Drawing Time of Four Pictures of Lady Wen's Return to the Han People/ The Eighteen Beats of Tartar Reed Flute (1)	Shao Yan	034
The Literary Men in the Drawing& Calligraphy Field in Jiaxing During the late years of Wanli Period	Wan Muchun	051
The Significance of Early Days' Sensible Choice to the Temperament Abstraction of Chimes and Nao	Kong Yilong	071

THEORY AND METHODOLOG

The Study of Art in Direction Changes ——the Methodology and View Angles in the Anthropology Research of Art	Fang Lili	082
Dance Anthropology and the Preliminary Study to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Exorcising Dance (Nuo Wu) in Guichi	Luo Bin	099
The Knowledge and Views in Art History ——The Modern German Philosophy & Art and Mr. Wang Guowei's Criticism Format	Yang Zhenyu	114

FIELD RESEARCH

The Culture Performance in the village ——The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the Exorcising Dance (Nuo Wu) and its ceremonies in Dangliyao Village, Guichi of Anhui Province	Meng Fanyu	130
---	------------	-----

YOUTH FORUM

From Literary Text to the Stage Art ——the Preliminary Review of Xu Muyun's Opera by Ontology	Mao Zhong	151
The development in Studying Zhu Youdun in the past 100 years	Wang Xuefeng	158
Multi-form and Diversity —— The Vanguard Art and its localization in Taiwan in 1990's	Chen Ming	167

THE SIGHT FROM OVERSEAS

A Letter to the president Wang Wenzhang	Li YouPing	172
---	------------	-----

ELITH IN ART

Zhao Jiancheng	180
Yan Ping	188

艺术研究的真谛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2006 年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孙家正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开学典礼”这四个字，很容易使人怦然心动。人生会面临许多选择的时候，诸位选择中国艺术研究院，选择艺术研究，我认为是一个明智之举。在目前风气之下，艺术研究实在是一项需要有人沉下心来，认真去做的一项崇高的事业。现代化、全球化在快速地发展，社会也在不断地进步，但是，这个世界实在是显得太喧嚣、太浮躁了一点，在这个追逐浮华功利的时代，需要有人静下心来，研究一点问题。

诸位选择了艺术研究，那么，艺术究竟是什么呢？仅仅是那些知识、技巧吗？艺术，说到底不过是人情感的载体，而对于人的情感的忽视，正是现代社会的弊端之一。现在，艺术差不多已经成为“技巧”的代名词了！我们走进书店、商场，浏览报亭、地摊儿，官场的权术、商场的谋略、情场的技巧，等等，等等，林林总总，五花八门，往往都赫然标着“艺术”二字。据说，《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在日本、韩国已畅销多年，恐怕人们兴趣所在，大抵也是其中的谋略、权术和技巧。其实，当代社会最应该重视的，人们恰恰淡漠了，那就是人的情感，而艺术恰恰是情感的载体。同学们选择了艺术研究，实际上就是选择了对人及其情感的研究。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或者说在文化的结构里，情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虽然属于感性的范畴，却是一切理性的源头、内涵和基础。这就是古人所说的“道始

于情”。如果离开人的情感，不以真挚善良的情感为基础，一切形式上的文明礼貌、行为规范只不过是一种虚伪和做作。从这一点来说，艺术研究是 21 世纪人类社会需要特别重视的。

20 世纪人类有许多伟大的发明和创造，把人送上月球，又开始对火星和其他星球的探索。人们花费大量的财力，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去探索那无穷的宇宙。但恰恰忽视了对人的自身的研究。人们在对外部宇宙探索的过程当中，宏观到天体、微观到原子、中子、质子，却往往忽视了另一个宇宙，这就是人的自身。每一个人就是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宇宙，可惜，我们对此知之甚少。人们对自身认识的浅薄，使人做出很多愚蠢而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同学们选择艺术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是正确的、崇高的。同时，这也是一种非常“时尚”的选择，这个时尚并不是广告上看到的那一类东西。而是指这一课题正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话题。法国作家马尔罗预言：“21 世纪的发展，要么是文化的发展，要么什么也不是。”所以，我祝贺同学们，在喧嚣浮躁的氛围中，能够沉下心来，选择了一个最值得研究的课题。

同学们既然作了这个选择，我觉得，首先就要以一种慈悲的情怀来研究学问。人要生存，要养家糊口，当然总得有一份正当的职业，但是对于艺术的研究，它不仅仅是一个饭碗。选择对于艺术的研究，必须要有对人的深层的关爱。对

人，包括对他人，对自身，对整个人类，特别需要一种人文关怀的精神。慈悲精神从来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的不竭动力。几年前我曾会见尼泊尔的一位佛教领袖，他不过14岁。吃饭的时候，我悄悄问他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非常的贪玩。您呢？”他说：“我也贪玩呀，经常偷偷逃出去玩一玩。”我问他的第二个问题，“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宗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中还有大乘教、小乘教，您对众多的宗教有什么看法呢？”他说：“只要你心存慈悲，善待他人，信教与不信教、信什么教都无所谓。”这句话使我对他的肃然起敬，他悟出了宗教的真谛。那么我们作为对艺术的研究者，是否悟透了艺术的真谛呢？

其次，要有忧患意识。科技的发展给地球创造了很多奇迹。但科技并不能解决人类所面对的诸多问题。20世纪医学科技的发展使许多过去人类面临的灾难消失了，麻风病、天花、霍乱以及其他许多疾病都可以解决了，但是有一类疾病，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开始以强劲的势头在上升，现在仍在大幅度地增加，那就是人类精神方面、心理方面的疾病，人类精神领域的问题，仅仅靠自然科学是难以解决的。人的身心和谐、全面发展有赖文化的功能。艺术不仅是情感的表达，也是情感的滋养。

艺术研究需要精研穷究，需要特别关注和重视人的终极关怀。我们古人有很多伟大的思想，这是我们宝贵的思想资源，我们需要根据现代社会的实际和要求，进行新的诠释、研究和发现。一种慈悲的情怀，一种忧患的意识，一种精研穷究的学术精神，我想，对于艺术研究，尤其不可忽缺。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地沉下心来，既不为时尚所惑，也不为积习所蔽。研，要精研；究，要追根究底。如同对宇宙的探索和认识一样，人类对于自身的研究和认识永无止境。也许我们永远难以达到穷究的境界，但在精研穷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不断地发现真理，接近真理。

总之，我祝贺同学们的选择，并且寄希望于

同学们。诸位怀着纯洁的心情、执著的精神，去追求学问，追求真理，追求有意义的人生，一定可以学有所成，心有所得。文化实在太需要有一批这样的人，这是文化事业发展的希望，也是我们的社会能够走向温馨未来的希望。

谢谢老师，谢谢同学们！

2006年9月29日

孙家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
(责任编辑：董雷)

分析指数与国家发展的文化标准

贾磊磊

内容提要 现代社会的和谐发展，除了经济力量的提升之外，还应当包括一系列文化力量的提高。这其中包括通过文化的方式缩小城乡差距，消除种族对立，化解群体性的心理危机，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提高教育与科学水平、铲除社会腐败等等。不管实现这些目标最终还需要一个怎样复杂、甚至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现在所关注的是：在目前我们通常使用的量化评价体系（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恩格尔系数）中，对于以上这些文化内容并没有确定一种可操作、可信赖的量化的文化评价标准。所以，我们除了采用量化的经济评价指数之外，还应当设定一种量化的文化评价指数，对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及一个国家的发展进行总体的评价。这应当包括一个由升学率、就业率、就医率、破案率、电视普及率这一系列相关数字组成的量化指数。同时，还应当包括犯罪率、离婚率、自杀率这些相关的分析指数。在综合这两种不同指数的基础上，我们确定一种更为科学、客观、全面的评价体系，来判断、衡量一个城市、地区和国家发展与进步程度。进而为我国，也为人类社会提供一种既包括着人文理念又行之有效的评价方法。消除因评价标准的缺失所可能产生的对地区及国家发展方向的误导。

关键词： 国家发展 文化指数 评价体系

任何一种评价体系都可能对其评价的主体形成特定的导向性。虽然没有一种方法是尽善尽美的，但是怎样建构一种趋于合理、科学、全面的评价体系，尽量减少因评价体系的缺陷对被评价主体的误导，是推进国家发展、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目前，采用量化的、实证的分析方法来衡量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是一种普遍适用的评价方式。在研究国家经济与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这种专业的评估指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科学价值。

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评价体系是否可信，主要取决于我们提供的数字是否准确、翔实；而数字的准确、翔实，往往又来自于这个评价体系的建构是否合理、是否科学。目前，世界在分析、衡量、判断一个城市、地区和国家强弱、贫富的时候，经常采用的分析指数主要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

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恩格尔系数（Engel's Index）、基尼系数（Gini Index）等一系列以经济指数为核心的评价体系。特别是GDP甚至被某些学者称之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它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以及失业率一起，成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兴盛与否的最重要依据。它们构成了我们今天衡量一个城市、地区和国家发展的硬性评价指标。这些指标也曾经成为我们追逐的发展方向。我们并不否认这些指数可以帮助我们衡量一个城市与地区的发展状况，甚至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可替代的评价方法。但是，不同的国家、地区、城市各自的情况也不尽一致，一种衡量的方法得到的数字就算准确，表现出来的客观实际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况且，用单一的经济指数来判断一个地区的总体发展水平，也并不全面。为此，在对传统的评价方法进行必要的反省的同

时，面对越来越复杂多变的社会发展现状，我们应当考虑一种更为科学、更为全面的评价体系，来加强与完善传统评价体系的缺失，并且防止因为评价体系的缺失对地区乃至国家发展方向的误导。

一、量化标准的评价盲区：在我们目前的评价体系中，没有与文化相关的统计指数作为评价一个城市发展的量化标准。所以，这种不尽全面、合理的评价体系是间接造成我们许多城市、地区出现种种负面现象的重要原因，这有时甚至会加剧单纯地追求经济发展、一味地追求GDP增长的不良倾向。

作为一个从虚幻的政治阴影和贫瘠的经济生活中摆脱出来的中国社会，在过去自然把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奉为地区与国家发展至高无上的“绝对律令”。在这个席卷全国的历史巨流中，GDP理所当然被当作衡量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量化标准。现在，我国经历了近30年的改革巨变，在政治、经济与综合国力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我们的经济得到了持续的、高速的发展。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显示，到2006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9411.15亿美元，储备额世界第一。但是，就在我们不遗余力地发展经济的同时，也相应地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说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社会贫富分化、刑事犯罪激增等。尽管这些问题的发生的程度不尽一致，产生的原因也各不相同，但是，它们多少都反映出我们对于城市、地区发展的评价尺度可能过多地强调了其经济的硬性指标，而对于其文化的软性指标关注不够，以至于在我们目前的评价体系中，根本就没有与文化相关的指数作为评价一个城市发展的量化标准。毫无疑问，这种不尽全面、合理的评价体系是间接造成我们许多城市、地区出现种种负面现象的重要原因。对这种看不见的无形缺陷，现在应当对其进行必要的调整与修正。

回首人类现代化历史进程，早在20世纪70

年代国际社会对于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一系列负面问题就给予了高度关注。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受罗马俱乐部的委托、以麻省理工学院丹尼斯·米都斯（Dennis L. Meadows）为首的研究小组，针对长期流行于西方的高增长理论进行的深刻反思。他们1972年提交的第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深刻阐明了环境的重要性以及资源与人口之间的相互联系。他们认为：由于世界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这5项基本因素的影响，全球的增长将会因为粮食短缺和环境破坏于下世纪某个时段内达到极限。进而他们提出：要避免因超越地球资源极限而导致世界崩溃的最好方法是限制增长，为此，他们提出了著名的所谓“零增长”理论。^[1] 在许多发达国家这种理论已经显示出对改变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与生存境遇的积极作用。

此后，曾经出现“有强调人与客观世界相协调的综合发展观，有强调自然资源反复利用的循环经济发展观，有强调个人自由和社会承诺的自由发展观等等”。^[2] 直到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纲领性文件。宣言提出“人类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他们应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使所有人都享有较高的生活素质，各国应当减少和消除不能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3] 这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观被全球持不同发展理念的各类国家所普遍认同。这一战略的实施意味着人类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和对变革的呼唤，意味着人类需要重新认识和调整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这种调整最终将意味着人们的思想方法与行为方式的深刻变革。特别是涉及到对于什么是发达、什么是富强、什么是幸福这一系列关于人类生存命题的重新思考。

近几年来，我国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正在

逐步改变单纯追求经济发展的改革模式，不再盲目地追求单一的经济发展指数。海外媒体也注意到我国已经“放弃数十年计划体制留下来的大部分量化经济目标，改变该国以社会事业和环境为代价对增长的执迷追求”^{【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定的“十一五”规划，在提出2000年到2010年这10年间使人均GDP翻一番的同时，保证在今后5年内降低单位GDP的能耗。国家更着眼于处理教育和医疗等社会支出以及废弃物和污染物的处理等环境问题。很明显，政府管理部门已经不再为了GDP增长而不顾环境和其他后果。温家宝总理在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新的经济增长指标。中国今年要在保持8%经济增长率的同时努力把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减少4%。这是中国首次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把能源消耗作为从宏观经济层面衡量经济增长的一个准绳。我们知道，随着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其能源消耗是非常巨大的。根据统计，2004年每1万元GDP所使用的能源相当于燃烧2.6吨煤，这个数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0倍，是日本的20倍。据统计，2004年中国GDP占世界总GDP的4.4%，但是其原油和煤的消耗分别占世界总数的7.4%和31%。如果能源消耗的增长超过了GDP的增长，这意味着资源的浪费、污染加剧和可能引发矿难。^{【5】}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一个科学的、和谐的发展观，对于指导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和全面发展具有多么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由于GDP实际上还包括了所有外资、合资企业在内的生产总值，这意味着GDP的攀升并不完全等于本土经济的全面攀升。据调查研究显示，中国28%的工业产值，掌握在外国人手中。^{【6】}这表明，虽然GDP在不断攀升，但是其中许多钱并没有进到中国人自己的口袋里，而是给了别人。包括我们许多创造了高额票房收入的影片，都是海外资本占据主导地位，在票房分成方面本土资本仅仅得到其中的一部分。跨国影视公司早就在为中国具有票房号召力的

主流商业影片投资，谋求其在中国内地电影市场的份额。《英雄》、《十面埋伏》、《功夫》、《天下无贼》这一系列中国电影的票房主力，都有美国及海外影片公司注入的资金。他们的利润都统计在我们年度电影票房收入的总额之内。在其他的生产领域这种情况也十分明显，包括我们现在并没有自己生产的大型民航客机，没有自己生产的航空母舰，而这一切对于一个强大的国家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而在GDP的统计中这些内容都无法体现。所以对于GDP的增长不能盲目乐观，应当看到其中隐藏的诸多潜在问题。

二、量化指数的适用偏差：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国际上的某些经济评价方法的一般标准来衡量我国的现实情况。中国的客观现实应当建立一种既能够与国际的评价标准相接轨，又能适合自己发展现实的评价体系，这样才能够真正把握我们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

在全球化的历史境遇中，我们有诸多涉及政策、法律、法规的内容，需要与国际间通行的标准相互接轨。包括某些普遍性的价值观也需要与国际上共同信守的文化理念相互对接，以避免被国际社会把我们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误读为偏激的民粹主义。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把国际所有的评价方法不加区分地平行移到中国来使用。换句话说，中国的客观现实应当建立一种既能够与国际的评价标准相接轨，又能适合自己发展现实的评价体系，这样才能够真正把握我们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现在，国际上常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这个在1857年由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阐明的著名定律其核心内容是：随着家庭和个人收入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比例将逐渐减小。恩格尔通过对家庭预算和模式的调查发现，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食品支出所占比例下降。支出上的变动影响了需求模式与就业结构。（恩格尔定律并不是指收

入增加后食品消费保持不变，而是说收入增加后，消费者在食品消费的比例下降。) 根据恩格尔阐明的定律，恩格尔系数越大，一个国家或家庭生活就越贫困；反之，一个国家和家庭的生活越富裕，恩格尔系数就越小。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 59% 以上为贫困，50%~59% 为温饱，40%~50% 为小康，30%~40% 为富裕，低于 30% 为最富裕。^[7]

我们必须根据中国的情况，来判断可恩格尔系数的适用性，而不能神话它在评价国情时的实际作用。在我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1978 年为 67.7%，2001 年为 47.8%；我国城市居民 2003 年的恩格尔系数达到 37.9%。尽管恩格尔系数在评价国家发达与否时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但是在运用这一标准对我国进行城乡和国际对比时，我们不能因为中国的指数与发达国家的指数相互接近，就得出两个国家的发达程度完全一致的片面结论。我们还要充分考虑到那些不可比的因素。如消费品价格的比价不同、居民生活习惯的差异以及由社会经济制度不同所产生的特殊因素。对于这些不可比因素，在分析和比较时应做相应的考察。另外，在观察历史情况的变化时要注意，恩格尔系数反映的是一种长期的趋势，而不是逐年下降的绝对倾向。它是在短期的相对波动中求得长期的趋势。国际分析报告显示，当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到 50% 以下，人均 GDP 为 1000~3000 美元阶段，文化消费需求会大幅增长。^[8]

如何评价一个城市和国家的发展是否合理、科学、有序，是世界上许多专家、学者始终在探讨的问题。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Gini Carredo 1884—1965)创建的基尼指数(Gini Index)，该系数表现了社会收入的不平均程度。基尼指数是在劳伦茨曲线基础上总结的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基尼指数的范围从理论上的最低值 0 (表示所有人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 到最高值 1 (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了基尼指数的标准 (Standard of

Gini Index)：一个社会的“基尼指数”，若低于 0.2 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 表示比较平均；0.3~0.4 表示相对合理；0.4~0.5 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 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9] 2004 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了 0.465，并将在 2005 年逼近 0.47。如果我们仅根据基尼系数的指数，很可能会得出一个我国目前两极分化的简单结论。据专家分析，我国基尼指数偏高的客观因素是：首先，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城乡差距大是我们的特殊国情；其次，我国一系列缩小城乡差距的政策调整从出台到发挥实际效应，需要特定的时间才能实现，尤其是长远政策的调整，其预期成效往往需要一个“生效期”；另外，城乡收入提速不均，2004 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2936 元，增长 6.8%，结束了连续 7 年低速徘徊的局面，但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更快，达到 9422 元，增长 7.7%，所以，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还有，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由于起点低、基数低，短期内绝对数的差距还会扩大。所以，这些都决定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国际上的某些经济评价方法的一般标准来衡量我国的现实情况。尽管我国的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但目前尚不能作出已经出现全国性的两极分化的结论。^[10] 所以，不论是恩格尔系数还是基尼指数在中国都存在着特定的“适用偏差”。

三、确立文化指数在国家发展评价体系中的地位：现在我们应当根据我国在经济与文化发展中的宝贵现实经验，结合国际化的评价方法，建立一种适合于我国具体情况的量化的评价体系。特别应当把文化指数列入到衡量地区及国家发展的总体评价体系之中，从而在根本上废止那种依靠单一的经济指数来判断发展与否的旧式评价体系。

尽管衡量一国的贫富、兴衰有许多量化的评价方式，比如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等，然而，由于这些指标本身并不能体现出自然

资源的消耗、环境污染的代价和失业率、犯罪率这些诸多至关重要的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所以，单纯的以经济指数为评价体系的发展标准，显然不能适应新世纪国家发展的战略要求。尤其是如果我们把GDP仅仅作为地区发展的单一评价尺度，就会掩饰许多在追求经济指数过程中被放弃、被忽略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会对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带来更重要的影响，甚至有可能间接造成经济的衰落及倒退。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上越来越注重那种不再以单纯的经济指标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乃至贫富的理念。2005年底，世界银行正式发布《国别财富报告》。以2000年的数据分析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构成基础，试图在其中找出财富创造的源泉。这份研究发现，国家越是富庶，自然资源在其资产中所占的比率越低，无形资产所占比率则越高。而无形资产的累积，又以教育及法治最为重要。世行此次调查特别设计出一套“法治指数”，用以评断一国人民守法的意愿及对该国法律制度的信任程度。而其研究结果显示，法治程度可决定一国57%的无形资本价值，司法制度越是有效、产权保护越是明确、政府运作越是顺畅，整体财富价值也就越高。世行规定法治指数最高为100，数字越大，代表法治程度越高。根据他们的评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平均指数为90，世界上法治指数最高的是瑞士，被评为99；而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平均值为28，埃塞俄比亚为16.4，尼日利亚和布隆迪两国甚至连5都不到。研究人员在报告中表示：“法治指数每提高一个数字，低收入国家人均财富总值就可以增加100多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人均财富总值可提高逾400美元，高收入国家的人均财富更可提升近3000美元”^{【1】}。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够对于法治指数的认定方法进行全面的把握，其有效性和可行性也难于判断，但是它的提出至少标志着人们在对于国家与地区的评价体系中越来越注意到非经济的文化因素对于国家整个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对一个国家的总体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曾经提出过人文发展指数(HDI)的评价标准。HDI主要包括三大指标：健康长寿的生命，用出生时期望的寿命来表示；知识，用成人识字率及大中小学综合入学率来表示；体面的生活水平，用人均GDP来表示。这标志着单一的经济评价体系已经渐渐“淡出”了国际化的国家评估理念之中。今年，英国“新经济基金”等单位提出了一份关于幸福指数的研究报告。在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区所做的“幸福指数”排行榜里，中国人的幸福程度排在第31位。在亚洲国家里仅仅排在越南(第12位)的后面，超过日本(第95位)、韩国(第102位)和新加坡(第131位)。根据该报告显示，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是瓦努阿图——南太平洋上一个80多个岛屿组成的小国。据报道这个排名在标准上完全不同于以前的其他幸福指数标准，更多地考虑了“获得幸福的投入产出比”——在指标计算中，更多地考虑了生态环境的因素。组织者说：“结果显示对资源的高度消耗水平并不能与‘幸福’直接画等号。”所以，8国集团的成员则全部被排在了50名以外，英国和美国的幸福程度被排在了第108位和第150位。尽管很多媒体和学者对这种评价体系的合理性予以诟病，其中最关键的是认为这个报告忽视了个人的收入水平对“幸福感”的作用，但是，幸福指数肯定了对地球资源低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肯定了绿色经济的价值取向，肯定了那些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效利用资源”的国家或地区的成功经验，这种幸福生活当然是人类应当共同认可的。现在，国际上一些心理学、经济学教授在致力于“幸福经济学”的研究。并且希望把幸福指数提高到与GDP同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深圳已经开始推出一组将“幸福指数”细化成“个人幸福量表”的量化评价标准，并且由统计部门统计相关数据，由市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定期发布计算结果。^{【2】}

事实上，经过新中国 50 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 20 多年的实践和探索，我们已经成功地建立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实际情况、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2005 年 5 月 11 日，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的长篇研究报告。雷默认为，中国的成就具有世界意义，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传统的西方发展观。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可以效仿的榜样。我国的发展经验正引起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有识之士的广泛认同。巴西、印度、埃及和东南亚国家等对“中国模式”普遍称道。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认为，“中国模式”就是“社会主义 + 中国民族传统 + 国家调控的市场 + 现代化技术和管理”。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说，中国经济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和范例”。^{【13】}现在，我们应当根据我国在经济与文化发展中的宝贵现实经验，结合国际化的评价方法，建立一种适合于我国具体情况的量化的评价体系。特别应当把文化指数列入到衡量地区及国家发展的总体评价体系之中，从而在根本上废止那种依靠单一的经济指数来判断发展与否的旧式评价体系。

2006 年 8 月 4 日，全国第一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效益的统计数据在深圳正式推出。这份被称为“效益深圳”的指标体系与过去那种以 GDP 为核心的传统统计方法最大的区别在于：“效益深圳”的指标体系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人的发展等方面设立了 21 个考核指标，最后以综合指数的形式对经济运行质量进行评价。在这个评价体系里显示：“效益深圳”的综合指数为 108.18%，与此同时，今年上半年深圳 GDP 增速首次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2006 年 8 月 2 日，浙江省出台 26 条党政干部综合考核办法，其中不再出现固定资产投资指标和招商引资指标，这在全国尚属首次。同时浙江省已

出现连续 24 个月工业增加值的增速低于全国水平的态势。^{【14】}这些现象表明我国的社会正在走向一个实现和谐、科学、全面发展的历史新时代。

我们固然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发展只是片面的 GDP 增长”。但是我们又不能不同意，“在这个发展或者增长过程中，缺失了以文化为基础的软性力量的发展”。发展应当是全面的、科学的、和谐的发展，所以评价发展与否的标准也应当包括诸如经济那样的硬性指标和像文化这样的软性指标。所谓发展，在哲学的意义上说：是事物从无到有、由旧到新、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数量到质量、由低级到高级的逐级变化。现代社会的发展除了经济力量的提升之外，还应当包括铲除社会腐败、缩小城乡差距、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提高教育与科学水平等等。对于后者，目前并不能够在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恩格尔系数中有所体现，所以，我们除了采用经济的评价指数之外，还应当设定一种文化的评价指数，对一个城市与地区的发展进行总体的评价。这其中应当包括一个由就业率、升学率、就医率、电视普及率、破案率这一系列相关数字组成的硬性文化指数，在这个序列里，文化指数的绝对值越高越好。同时，衡量一个城市发展的评价体系还包括犯罪率、离婚率、自杀率这些文化指数的绝对值越低越好的评价系统。在综合这两种不同指数的基础之上，确定一种更为科学、客观、全面的评价体系，来判断、衡量一个城市和地区的发展与进步程度。进而为我国，也为人类社会提供一种既有人文关怀又行之有效的评价体系，以消除因评价标准的缺失所可能产生的对地区及国家发展方向的误导。

注释：

- 【1】[美]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出版，第 8 页。
- 【2】丹增：《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云南文化产业发展》，中国文化产业（国际编委会）编，《第二届中国文化产业（国际）论坛论文集》（上册），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5 年出版，第 11 页。

- 【3】转自：新余环境保护网，2004年8月19日。
- 【4】见英国《金融时报》3月7日文章《中国放弃僵化的增长目标》，《参考消息》2006年3月8日第16版。
- 【5】见《香港虎报》3月6日文章《朝着“绿色GDP”增长的第一步》，《参考消息》2006年3月8日第16版。
- 【6】见法国《回声报》3月20日文章《中国正当的经济爱国主义》，《参考消息》2006年3月22日第15版。
- 【7】恩格尔定律 (Engel's Law)：以德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恩思特·恩格尔(1821—1896)的名字命名，他于1857年的论文中阐明了这一理论。恩格尔研究发现，家庭收入越少，其在食品上的消费比例越高，反之亦然。也就是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消费也随之增加，但后者所占比例减少。恩格尔指数 (Engel's Index)：反映这一定律（恩格尔定律）的指数被称为恩格尔系指数。恩格尔指数 (%) = 食品支出总额 / 家庭或个人消费支出总额 × 100%。“恩格尔曲线” (Engel's Curve) 表示的是消费者的收入与某一商品的需求量之间的函数关系。转自：http://fr.encyclopedia.yahoo.com/articles/e/e0002360_p0.html，北京统计信息网，2003年4月9日10:55:57。
- 【8】刘光溪：《后WTO过渡期我国文化产业化的内涵及其战略选择》。见中国文化产业（国际编委会）编《第二届中国文化产业（国际）论坛论文集》（上册），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5年版，第42页。
- 【9】转自：http://www.leftbusinessobserver.com/Gini_supplement.html, <http://mathworld.wolfram.com/GiniCoefficient.html>, http://www.paho.org/English/SHA/be_v22n1-Gini.htm
- 【10】《2005理论热点面对面》，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73页。
- 【11】《教育、法治富民强国》，台湾《商业周刊》1月9日第1期，《参考消息》2006年2月3日第4版。
- 【12】唐旺盛：《幸福指数为什么不能取代狂热的GDP崇拜？》，2006年7月18日《中国经济时报》。
- 【13】《咬定青山不放松》，《2005理论热点面对面》，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135~137页。
- 【14】魏英杰：《提高人文含量，告别“唯GDP”发展》，《南方周末》2006年8月10日第1版。

贾磊磊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陈明)

论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原则

王列生

内容提要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总体框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文化工程。要想这一体系得以有效确立，必须以三个基本原则为构建行动的满足条件，那就是公平正义原则、普适价值原则和基本权益原则，此三者也是现代社会政府力求的基本价值尺度，不以意识形态不同而有异，而其满足的程度，将直接影响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功能形态和完善状态。

关键词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公平正义原则 普适价值原则 基本权益原则

所谓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原则，其实就是最一般意义上的普适原则，或者说这一体系存在合法性的必要前提，之所以作这样的表述，是因为有必要在特定语境下给予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规避，是因为意识形态关联或者提升乃是另外一个意义界面的事情，而通常我们之所以在一系列社会事务叙议中纠缠不清，恰恰就是意义界面的议题混淆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自觉的规避本身就是一种学术理性的选择。当然，规避不是逃避，而是科学地予以层级排序和价值归位。

这一议题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从根本上制约着一切在此议题涵括下所议的合法性，进一步则同样会制约其问题真实性和解读方案的有效性，最终也就会对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所为作质疑性的裸露追问，直接关系到“公共”和“服务”这两个关键词能否获得命题嵌入的命运去往。

—

按照保罗·皮尔逊的叙述，全球化提速导致“所有的福利制度都陷入了困境。尽管在这一点上大家的意见基本一致，但是在理清可能产生困难的因素、明确这些因素对各国福利制度造

成压力的具体过程或确定它们的相对重要性等方面的认识上一直进展有限”^[1]，非一致性在于，各国福利制度所推行的利益公共化政策所遭遇的利益障碍程度、障碍点及障碍层级彼此极大的差异，一般说来，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在解决福利程度的第一个要件即公平正义的现代普适性方面，就遇到了理论抵制和实践不作为，所以继起的一切后续问题实际上也就无从谈起，或者说即使谈论也是不着边际。就中国福利制度而言，既然福利和救济还都混为一体，那么清晰地讨论诸如福利的制度设计也就还为时尚早，所以我们也就只能在理论操作层面直接进入诸如“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一类议题的思考，因为类似的议题一方面从根性上受制于福利理论和福利的制度设计等，另一方面其意义界限又远远超出了福利之议的边界，因而我们的思考从一开始也就具有明显的中国问题特色或者中国式思考方式的痕迹。

正是按照这样一种思考方式，我们认为在中国语境探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际，需要在理论和实践操作层面确立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公平正义原则。实际上，人们并不是此前就没有意识到这一原则的迫切性，而是没有获得充分的话语权利，因为在从前的语境下这样一

种原则表述方式被认为是模糊了意识形态意义边界，只有在陈述资本主义社会事态之际才被允许使用类似的专属语词概念。只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对国际社会融入的提速，只是随着政治理性和学术理性的逐步确立，甚至只是随着权威政治文本对类似专属名词的解禁乃至规范化言说，我们才可以既放心大胆同时又不加求证地使用“公平正义原则”。

但是这个不加求证同时又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是言说之际不对这一原则命题先行语义定位，一种模糊语义的遣词造句方式的广泛流行最终就会导致科学命题的口号化，口号化的顽症在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已经成为问题流失和科学解读方案难以形成的巨大意义缝隙，说得严重一点，社会科学研究中大量浮泛和简单重复的口号式文献堆砌，实质上就是科学发展观在社会科学领域得不到贯彻的具体体现之一。既然如此，在我们思考以公平正义原则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际，就必须对这一命题的语义要旨进行在场言说的意义互约，就必须对原则本身作基本的知识谱系梳理和明晰化，甚至首先必须对语词概念作语源学的意义沿波讨源，尔后才能对其进行放心大胆的使用，并且每个使用者才能因此而在意义互约之后省略言说者的冗繁阐述或者说可以不加求证。

就中外文献的知识记载而言，公平和正义的意义表述和价值追求都是非常久远的事情。《诗经》的十五国风中，“魏风”就绝大多数是对社会不公的事态描述和情绪化追问，而《小雅·节南山》的所谓“节彼南山，有实其猗。赫赫师尹，不平谓何？”更把这种追问提升到国家政治诉求的高度。至于墨子所说的“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墨子·兼爱中》）、老子所说的“民莫之利而自均”（《老子·三十二章》）、孟子所说的“仁政之于平治天下，犹规矩之于方圆，六律之于五音”（《孟子·离娄上》）、慎到所说的“有权衡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长短，有法度者不

可巧以诈伪”（《意林》卷二引）、韩非子所说的“权衡县而重益轻，斗石设而多益少”（《韩非子·有度》），诸如此类之议，都不妨可以看作先秦自由主义思想体制时代知识分子们对公平正义的朴素观念。这种朴素观念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同样也很流泛，柏拉图《理想国》在第一卷展开“苏一克”叙事结构之际，首先讨论的就是“正义”的意旨、国家存在价值和不可逃避地位，并在批驳色拟叙事“在任何国家里，所谓正义就是当时政府的利益”^{【2】} 伪命题基础上，得出了正义国家理想状态下的“在任何政府里，一个统治者，当他是统治者的时候，他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属下老百姓的利益，他的一言一行都为了老百姓的利益”^{【3】} 乌托邦式选项。所以，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才更加深入地讨论“根据市民天生平等的理由，这并不可能，同时，所有人都分享治理权才是公平的（无论从政是件好事还是件坏事）”。^{【4】} 一直延伸至古罗马西塞罗强调“如果没有最严格的正义治理就不可能，否则的话，我们就必定认为，至此为止我们所提出的关于共和国的一切论断等于零”^{【5】}，这中间其实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实时讨论和知识拟议程序，从而使公平正义不仅成为政治学、伦理学等领域的普议性话题，而且也成为日常社会层面的普遍关注对象。所以说，公平正义命题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有其深远的语源学轨迹和知识衍生历程。

但是这个历程此后更加经历着现代公平正义观的结构性意义颠覆，即古典形态的命题存在结构机理乃是自上而下，而现代知识谱系下这一命题的有效性则是建立在自下而上，也就是说，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开始一直到罗尔斯的《正义论》，讨论公平正义的经典性著作都已经转型为从社会基础的内在要求和社会生活的一般原则的角度切入，这种切入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命题指涉上升到了政治哲学和道德形而上学的高度。尽管在现代知识谱系下这一命题的解读路向一直存在着“功利主义”和“直觉主